

中国知青部落

(修订本)

郭小东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001号

中国知青部落

(修订本)

郭小东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插页 300千字

1993年2月修订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1-01500-1/I·47

定 价：6.80元

宁可没有悲壮，没有史诗的诞生，没有刻骨铭心的青年时代的记忆，人类也不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去换取本来就不应该有不需要有的知青文学的辉煌。

对于知青文学和知青作家来说，归根到底的清醒和深刻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们曾经经历和面对的，是人类本来就在逃避和并不愿面对与经历，而又不可避免地面对与经历的东西。

悲剧正是如此诞生，必然的丧失也就成为必然。

南北方的痉挛

(自序)

不管他们走得多么昂扬，在我的灵魂中，我与他们一样，永远是跪着的。仿佛在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但是极端伟大、极端神秘的力量在呼唤着我们，在逼视同时对着我们喊叫：你是有罪的，你该罚！于是，我们集体地跪下了。尽管我拼命地想爬起来，可是那力量紧紧地扼住我，我无法挣脱它的制扼，我只能永远地跪下去。

一个声音，苍老而又悲凉，颤抖着，震栗着对着我们喊：跪下吧！跪下吧！

我们跪下。集体地下跪。

可是，“我不是对着你跪，我是跪在人类的一切苦难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说。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人格却永远地站起来了，作为真正的人站起来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把这种灵魂的真实裸露出来，是因为我不愿意虚伪和媚俗而去侈谈什么高尚。我们本是一些生活在假面和伪饰中的人，即使是曾经有过的真诚，也是被邪恶奸骗了的。因此，我盼望在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少一些假面而多一些我灵魂中的真实，哪怕这真实也已经部分地让伪饰奸污了，那也就真真没有了办法。

我曾经发誓，我将永不忏悔。让一切已经淡忘的都过去吧！让一切的悔恨和命运中不羁的灵性都随着岁月的漂逝消亡吧！可是，我能够吗？曾经发生的、无法抗击的时代的恶梦，那些无知的英雄主义，自以为伟美的坎坷人生，如歌如梦的痴迷憧憬，岂能化作一缕轻烟飘散？

我与我的知青伙伴们，之所以永不忏悔，全然因为我们的一切

过错，一切罪恶都是那个时代给予的。我们曾经非常欣慰地告白于天下，我们的一切苦难，几乎都产生于利他的意愿的理想。我们的一切憧憬，都与渺小的猥琐的人生目的无关。即使是曾经沉沦和已经沉沦，我们也将对着这个世界执拗地争辩：我们真诚而且真正地活过了！因为我们的受难，是集体地受难，我们没有个体也不需要个体。这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也自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荣耀。

我们将为此自豪。

——这些近乎梦呓、语无伦次的议论，是我写下了《中国知青部落》这部长篇小说之后，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常反躬自问的内容，似乎是白日梦中的无字的呢喃，如歌的行板……

我们这一代人所亲历的，所体验的，并为之献出年轻的真诚、童贞一般明净圣洁的朝觐的年代永劫不复了。人们开始淡忘它，淡忘那些曾经雄赳赳，曾经放眼世界而且坚信世界必将在他们手中实现一片红的知青们。即使是知青们自己，也已经开始忘却他们自己的过去，或者将其深深地埋进尘封的历史中去。一种全新的生活已经取代了那辉煌但又黯淡的一页。

即使如此，正因为如此，当我于1984年10月再度云南边地，进入西双版纳深处体验生活时，我的生命仿佛重新经历了一次已经淡忘但很熟悉的震撼。每一个有良知能思索的人，面对西双版纳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怪石嶙峋的流沙河道，面对蜿蜒于丛山峻岭中的中缅边境遥远的谷地，面对无数缅寺的尖顶，你无法不重新走进你，走进你过去的生活和经历中去，去寻找那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几十万、上百万、千千万万当年知青的灵魂，再度审视你自己，审视你自己走过的每一脚踪。

我之于西双版纳，完全是一种偶然的陌生的君临，是应云南省作家协会和云南农垦总局的邀请，去参加他们联合主办的知青作家笔会。先去西双版纳，然后再去滇西的大理和畹町。同行的有

北京的刘庭华、文叔，上海的修晓林，四川的金平和余德庄，还有晓剑和严亭亭夫妇。他们都是当年的云南知青。我与王超英例外，她是北大荒知青，我是海南知青。本来还有王安忆和张抗抗、孔捷生、梁晓声等，临了他们没有来。

西双版纳和海南岛在同一纬度上，地貌和森林景观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人的种性和宗教传统以及来自外域的影响，又是全然不同的。相比之下，海南岛要显得更粗朴和稚拙一些。而西双版纳秀美的原始中，似乎埋藏着更为幽密更为神秘的情绪。宗教化的人生形式渗透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空间和时间，在冥冥中启悟着人的精神状态。处处有神迹，同时令你感觉神祇的主宰。

张曼菱曾经在这里插队，写下了著名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就是那部电影《青春祭》的最初雏形。我在她插过队的地方，理喻张曼菱的小说心态和人生体验。她把最形态化的生活情绪化、内心化了。但是她毕竟还是对那种生活抱着一种肯定的态度。那是可以理解的。写作背景和时代局限无法使她从一种文学的时尚态势中峭拔出来。她后来在改编成电影时，就已经觉悟到小说的某些表层表述的欠缺性了。所以电影叫《青春祭》。她开始用一种祭奠的心情来反思痛切那种生活了。

那里的美丽是千百年的自然塑造，那美丽中有着一一种残酷的浪漫精神，这种来自宗教也来自人心的残酷的浪漫精神，在时代畸变中被异化了。变成了许多人的集体无意识。

我想，之所以云南知青会爆发那么剧烈的动作，会做出那么多令世人瞩目而又近乎自我牺牲的举动来，与西双版纳无处不在的宗教气氛有关，也与对另一种现代宗教情绪的信仰破灭有关。因此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叛情绪：用原始土地赋予的宗教情绪来反叛现世的压抑。

近于颠狂的执著，执著到颠狂的顶点，一切又似乎仍然是以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利他意义为基准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以

极度的愤怒和韧性，极端的行为所谋取到的知青集体回城的时刻到来时，他们却又纷纷放弃回城的机会，走下向北方开行的知青专列，而毅然走向南方西南，奔赴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慷慨赴死！

我刻骨地相信，生活中发生的这个重大转折事件，精神上的纽带是一如既往的。所以，在这部书中，我能做到的不在于对他们的客观评判，而仅仅是力求以一种比较真实的文学描述，来完成对他们中极少的一部分人，也可能是极皮毛的他们的故事的抒写。我无法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关于云南知青们真正的人生，真实的而且更震撼人心的故事，大部分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里，许多人不愿意再提起它们。面对过去，大部分人是取一种相当平和相当睿智的态度，即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往事不堪回首也不愿回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可是，作为文学家，没有理由取这种态度，没有理由让历史泯灭于泥沙之中。

我自身的经历于我有这种责任。因为我也曾经是一个知青。

在云南西双版纳，与其说无处不感觉着宗教神祇的威慑，不如说我在这种神祇面前，感觉着一种很遥远但很熟悉的体验，那就是那无处不在的知青的魂灵。

在每一片原始森林和人工种植的胶林里，每一条黄土公路或南昭时代遗落的古驿道上，在每一条汇流向澜沧江，奔腾向境外湄公河平原去的大小溪流中，我都感觉着当年云南知青的呻吟和欢呼。所以，我与晓剑跪倒在多座知青坟前，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激越地冲破胸膛，弥漫在静谧得如同史前时期的大自然中。我们毋须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来自于哪座城市！因为什么死去而被掩埋在这里！我们只知道他们是知青就足够了。在如花的年华中夭折，大多是为着一种对于他们来说是崇高的或者很偶然的殉难。

我默默地拔去坟堆上的杂草，遥想当年小乔初嫁了的情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辉煌，而他们早早结束了。是不幸呢还是有幸？

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知青已经不很多了，即使是没有回城的知

青，也已经流浪异地，有相当多的人当年逃到缅甸山地去，参加缅甸共游击队，履行国际共产主义义务去了。这些发生在当年的事情，今天还会发生吗？我不知道。

在勐腊、在橄榄坝，我都见到一些当年的知青。他们留下来，也将永远地留下来。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年知青的模样，连口音也变得与云南官话无异。他们是少数没有卷入当年知青请愿运动的人，他们属于知青中比较成熟也比较超然的那一部分人。

我与他们自然一见如故，但时间匆促，没有深谈似乎也没有更多的话题。我的注意力全在我的伙伴修晓林身上。

这个人极有魅力。在勐腊当了十年知青，在第九个年头当上了农场小学校长，第十个年头上病退回城顶职。最初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当校对助编。在30岁上拖儿带女读函授，拿文凭、写作、编书，生活中依然未脱老知青的一切感觉。我们同住一屋。他不爱玩，云南的一切对他太刻骨铭心。我们住在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研究所的招待所里。一座花园别墅式的房子。各种域外境内的奇花异草都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森林和大自然的一切东西都难以压倒心底里对知青生活的那么一种沉入。除了晚上与版纳青联和学校的青年们联欢之外，我们都躲在屋里谈天，谈他们过去的的生活，谈我在海南知青农场的经历。被我写进这部书中的相当多人物和素材，都是修晓林提供给我的。原来应该由他来写，但他却有一种太逼近反而太淋漓的感觉。我知道他心中永远保留着一种对过去生活的神圣感和崇拜感。这种感情一经说出，写下来，就必然有些走样，有些褻渎了原始的神秘：也许那一切对于他太惊心动魄，他难以极为真切地复述那弥漫于故事之中的精神。所以他不写，由我来写。我带着一种惭愧一种迫切进入了当年云南知青的大疯狂之中。在幽静的树林里，在永远没有尽头的山路上，在夜里黑沉沉的池塘边，我听着澜沧江激流冲击着堤岸荒草的咕咕声。设想着黄昏大雨欲来之时，澜沧江上空乌云密布但是阳光奋力穿透乌云，而终于把乌云斩得七零八落，落荒而逃的景致。拖船在急流中缓

缓地上行，傣家竹楼上永远没有灯火，江滩上淘金人的马架子永远挂着一盏只有我才看得见的小马灯。这一切太能勾起我对知青生活的依恋和情结了。也许这种情结，连当年的知青也觉得好笑没有价值。有些知青作家也已经开始在嘲笑这种情结而自觉进入另一种所谓“现代感觉”了。而我不能。我将永远地投入，无法忤逆我的感情，也许正是我最终无法摆脱一种既定的人生框架，一种无法更改的执著情绪的悲凉结果，也终将注定了我无法进入伟大作家的行列。这些于我似乎已没太大的诱惑了。我只是希望我能比较真诚地记述云南知青们当年的真实。我自然也就免不了倾注进我对海南的体验结晶和对知青的情结体现，自然也就倾注进一些我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情调，一种感伤的理想主义情调。

我完全理解修晓林以及其他成功的知青们对于这个知青事件的文字缄默。作为海南知青同时也作为出版国内第一本知青文学研究专著《中国当代知青文学》的我来说，我没有理由回避这场悲剧；这场悲剧的全程无法令人沉默。我应该尽力从中剥离出一种属于知青一代人中最本质也最容易被人误解，最容易为人忘却的精神——集体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他们虽然是被耽误、被误解的一代人，但是他们活得有价值。所以，我写他们，也写自己。

我明明知道最有资格写这部长篇小说的人，应该是那些当年亲历知青大疯狂和大逃亡的云南知青，如我小说中的人物马戈、侯过、方炜他们，他们为请愿卧过轨，在九死一生的冒险中疯狂地抗争过。他们是最有资格用文学的方式再度发言的人。这其中自然包括修晓林、晓剑诸君。即使我也曾是知青，但是无论如何我是很难极为准确地描摹当时的情景的。

可是，作为知青，我又是那样深切地感觉着他们当时的情绪。修晓林只不过向我讲述了许多梗概，这些事件梗概本身所包藏着的情绪以及人物的心态要点，却是那样深刻地沉入我的灵魂中。

我想，我与云南知青共同的部分，正是大时代对于那一代青年的普遍馈赠。混合着希望和失望，光明和黑暗，无法把握也难以预测的现在与未来等等，都极为惶惑地驱使着知青们的行动。这种盲动几乎贯穿着所有知青骚动事件的全程——我曾经也用这样一种评判来审察云南知青在1979年的大动作。当我在西双版纳的土地上，与当年曾经参与那些事件的知青们交谈时，从他们淡然而且已经消退了激情的回忆中，包含着重新评价的回忆中，我发觉我一开始就限定的标准是彻底的错了。他们的请愿并非仅仅为着自身的生存状态的更新。这是一种很容易被误解，也很容易被简单否定掉的动机。

诚如我在这部小说中要着力表达的那层意思，即知青们对于回城问题的认识，是超越了一种庸俗和短视的眼光的。当然，这种超越更多的是表现在一些知青领袖身上。他们基于对知青运动的深切反思之后的缜密分析，以为知青运动的最要害处，乃是以一代人的放逐，无意中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层。一切优秀的质的和量的断裂，都无可避免地归诸于对这一代人的漠视行为。这是整整第三代人的全面溃退。他们呼吁回城，更深远的原因是对这个断层的补救。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代人在即将湮灭之际的及时奋起，对于中国前途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一切过激的行为，既是当时社会时尚的产物，又是他们别无选择的唯一出路。倘若我们还能对此抱一种客观的宽容的态度的话，则我这个观点读者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决定了我在小说中对知青们采取了一种相当复杂的态度。连我自己有时也常常失之于困惑之中。但是有一点我是极为明确的，那就是他们从里到外的利他主义和忧国忧民的强烈的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是这一代人中最优秀也最杰出的思想动力和行动准则，正是这一点，使他们的人生永远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即使是被动的行为里，也溶解着一种主动精神。否则，我们就无法理

解，在他们已入而立之年，经过了无数艰难困苦，终于获得再生机会——回城之时。却纷纷转而去拥抱战神，再度走上一条充满荆棘和悬崖的道路。

这正是这一代最为本质也最为伟美的人格精神。我想，即使知青们有着万千的谬误，可是单凭这一点，便足以印证在这之前他们的所有行为包括激烈地争取自身生存状态的请愿等等，其动机是相当崇高的。

他们事实上是极为负责任的一代人。我在这部小说中着力表达的也正是这一精神要点。

这一精神要点普遍地深藏于小说人物的灵魂中，我对所有人物都一无例外地赋予这种烛照。即使是那些在行为上已经构成了流氓无产者或江湖上人的劣根性表达的人物，如车剑洪、何亚义这些或外逃或沉落于芸芸众生的非英雄化人物，我也极力透视他们在劣质弥漫的人性范围中，哪怕是星星点点的优良。良知的点滴发现，对于这些人物来说，无啻于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在这火里燃烧着的，至少是一种对别人的负责。在再卑微的人生里，也存在着人所共有的对人的负责。我确信这一点。

我对这部于激越与匆促中完成的长篇小说，并没有寄望于史诗式的憧憬。我只是历史但是文学地记述发生在中国大陆70年代末知青运动史上残缺的一页（这是一个人们永远无法遗忘、无法避讳但是却因种种原因被忽略、被埋藏起来的话题）。我只想告诉后来的人们，知青们不幸生于那个动荡的年代，但是，他们有幸地参予了那永生难忘、举世瞩目的知青运动以及知青大逃亡。天堂或者地狱，那无关紧要。问题是，他们真实地且鲜血淋漓地活过来了。他们面对命运的大逃亡所产生的抗击厄运争取自由的非凡勇气，包括某些面对残酷的懦弱，我都给予充分的同情。因为我也曾经是知青。但愿人们能从这残酷的历史事实中记取点什么。

这场发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知青运动，在此后10

年间，从狂飚突起到大规模的退潮，这个来去匆匆的历史事实，淹没在当代中国熙熙攘攘的政治运动中，它无论对于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或是对于每一关注着中国现实政治，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外国专家们，至今都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地解释这个运动的缘起以及运动过程的种种变幻，包括它后来悲剧性终结的历史原因。许多文学作品试图阐释这一点，但依然仅止于对知青运动过程中人物的描述和心理分析。也许对之作出政治的、社会学的分析，是史家的事，文学只担负它对于生活的表现与描述。我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自然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我只是作为知青运动中一员，对曾经经历的，震撼我自己也震撼读者的那些重大事件作文学的再现。我很明确的意图，仅仅在于力求肯定这一代人中优秀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同时批判他们趋附于时代错误的某些劣质。我企图在我的小说世界中把人物精神状态中的上述思想特点予以充分地显示。包括对人物各种形态和内涵的宗教情绪的体现。我想我只能从他们思想中的这些构成因素中去寻找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执著的最根本原因。

没有归来的夏云——一个纤弱而豁达的女巫一般的女性，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上战场，以赴死的激情和胆气平静地完成生命的涅槃。她把国家的命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和爱情一样的神圣。于是，她钟爱生命，向往爱情，也就义无反顾地把这一切贡献给神圣的卫国战争。她没有任何激昂和英雄的前奏，她仅仅以一种超然的淡泊参与了神圣的事业。她的没有归来正是她永远存在着、屹立着的证明。因此她才值得人们深深地思念，值得恋人马戈终生的期待。期待使她的淡泊凝聚为人生的顶峰。

我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激情，这种激情是以相反的方式实现于小说之中的。我极力以平静的心境去揣摩她、塑造她，她事实上是我人生境界的一种臻于完美的追求。

主人公侯过是知青部落中的领袖人物，他是中国第三代人的极端典型。既是固执的利他主义者，又是雄浑的精神理想主义的

奴隶。他渴望炼狱，渴望悲壮，渴望灵魂的完善与升华。他为了不让人们指责他领头鼓动知青请愿回城有什么私欲，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后，断然与苦恋了十年的女友饶一苇结婚，断绝了个人回城的一切机会。其他几位知青领袖也基本上是侯过型的，都具备了一种纯粹的献身精神。

在侯过这个人物的描述中，我始终充满着一种对人的体恤。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知青领袖，人道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变形，充满着心理矛盾的种种迹象以及性格分裂的种种表现，都是值得同情，且值得我认真地复原的。庸俗的人与伟大的人的差别，不在于伟大的人没有庸俗，而在于庸俗的人不能发现自己的庸俗，而伟大的人却常常发现自己的庸俗并革除这种庸俗。这是我塑造侯过以及书中其他人物的一个准则。我想这并非什么崭新的理论，而是生活的原型就是如此。生活也不只一千次、一万次地向我们强调了这种真实的存在。

所以，我努力还原侯过作为人的本质真实。他领头上京请愿、卧轨。在战友们回城之际，又毅然奔赴战场。可是他毕竟是一个负担了太多精神债务的人，战争向他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和考验。战争的惨烈和血海令他惊惧。多重的精神压迫启发了他人性中的弱点，求生的本能与思恋的懦弱于他瞬间沉沦了。他拔出枪自伤溃退回后方，被军事法庭判刑入狱。一年后释放归来，上峨嵋金顶朝佛，路遇终生挑担上山的老挑夫半山圆寂。他忏悔且顿悟人生。于是，他无言地接过老挑夫的挑子，每天把红砖从山脚驮上金顶。他从自虐中领悟宗教，从中寻找灵魂的归宿。他并不信佛，他只是使苦行僧式的信念重新在新生活中延续，不至破灭且亵渎初始的憧憬。

我并不以为我在这部小说中写出了什么典型人物。但是我坚信我的真诚所导致的必然是我所苦苦追索的深刻。因此，我笔下的所有人物，尽管苍白或渺小，但是，他们在各自的人生中，永远地审判着自己，又永远认为自己是最高尚的。他们背上驮着即使不

是十字架，也是山一样重的历史使命。

即使是为自己的动机，他们也永远生活在利他的憧憬中，生活在一种无法说清也无法解释甚至无法对自己负责到底的生存状态之中。每一个人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中，都充当了只有过程没有结局的角色表演，是悲剧性的悲壮的长调，是荒唐的独白，是现代社会的原始萌动，是令人永远忏悔又永远惊惧的人的真实——我这样理解我笔下人物痛苦的灵魂的呐喊。

于是，我把这部原名为《第三代人》的长篇小说，在付印之际，易名为《中国知青部落》。我想，唯有它才能准确地表达我对第三代人中这一部分人的精神概括。

近乎原始部落的蛮野，如兽奸，如疯人之恋；荒原上无穷尽的种种压抑所导致的种种鬼诡，如鬼畜，如自阉，如神秘的林中坐化……我尽情地展示现代社会中的原始与蛮荒，人性的扭曲和生命的极度舒张与贬损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我似乎意识到有一种很原始的野蛮的来自人性深处的生命冲动，在主宰、干预着现代生活的内容与形式。最现代的生活内容，有时可能会以最原始的形式负载，反之亦然。文化大革命就是以一种极为现代的形式，运行着最原始、最野蛮的内容。知青运动进程也逃不开这种规律。只要发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异常、一切的不合理，都是一种适时的正常和合理，只要它是适时的。

我不想过多地就这个问题饶舌，我的这部小说是写给知青们以及关注着知青命运的人们读的。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人当过知青。这样广泛的社会触及，会使我这本小说得到更大范围的验证和批评。因此，毋须我喋喋不休地解释。我想读者们终将会理解我把“知青”与“部落”组合在一起的浅显真意。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道白了我对于知青运动的下意识评判。

也许群体的时代很快就行将结束，个体的魅力正在补充在取

代群体的个性缺欠。知青的部落形式及其部落精神，包括它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正在渐渐地消失。人们包括知青们也正在慢慢地脱离这种群落的规范而充分地发挥人的主体精神和作为人的个性魅力。无数的个性凝聚而集结成的崭新社会，必然是一个充满着活力和社会智慧的社会。为此，我认为中国知青部落在某种意义上，以其社会行为和意识形态，强化了一个时代的特征，成为一种行将消失、无法持久的历史现象。正因为它的短暂但是强烈的形态化特质，使得它的历史地位显得突出，独特于许多平庸的缺乏个性的历史阶段。

从这种意义上说，哪怕我们对之的投注是一点点的真诚，这真诚也会因其独特和突出而无限地蔓延，从而净化且调动所有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对过去时代的遗迹，寄予一种公正的期望。

我知道我喋喋不休，不遗余力地近乎呼吁地希望读者对这一代人产生兴趣——对他们曾经经历和将要经历的人类遭遇产生一种深切的同情——然一切希冀是多么傻气，是一种很不值钱的知青情结所致。可是我还是要顽强地表达这种近乎感伤的情调。我们没有理由将这群曾经迷途的羔羊，为利他而迷途的羔羊，视作受伤的狼。即使知青情结将受到包括知青作家在内的任何贬损，我还是固执地宣称，在所有的人的群体中，这一群集体地受难而又始终承受着时代不幸的人们，他们是最值得人们去深深理解与体恤的。该扬花的时候，风来了，吹落了一切花蕊；该吐穗时雨来了，将其打得七零八落；该结果时，收获的季节已经远远地逃遁了。他们没有任何责任！从大的社会学评判上说，他们唯一有罪的是，时代生活注定了，裁决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青春无价，青春毋悔，青春丧失——有什么比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们自己更令人震栗与嗟叹，更悲凉的么！没有。

当然，我也相信而且已经觉察到这一群落对时代和社会曾经有的破坏，那种历史性的破坏成为社会的遗患，这是难以饶恕的。所以，我在小说中不时地注入分析与批判。我希望事过境迁之后，

一切人都持一种旷达而又宽容的姿态来迎接一切历史的诘问,人民的诘问。无可避讳也无可掩饰。

不管他们走得多么昂扬,在我的灵魂中,我与他们一样,永远是跪着的。我们集体地跪下,是跪在人类的一切苦难面前,并非为着某一个人跪。

谨以此书,献给曾经送出四个子女去当知青的我的故去的父亲郭大藩,我的仍健在的母亲马燕惠。我将永远以一种无法抹去的怀恋,感激他们对我,对我的姐姐和兄弟们在非常年代所尽的义务和无私的努力。我将永远地以一种忧郁而感伤的眼光注视着他们曾遭不幸横逆而无吁叹的灵魂,直至安息。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千百万北方、南方的知青朋友,献给与知青们一起含辛茹苦,携手共进于苦难年代的知青妻子连同他们的父母们。

献给注视着南方的北方的痉挛。

是为自序。

作者

1990年6月28日9时

广州·在雨中

目 录

自 序：	南北方的痉挛	(1)
楔 子：	历史的悲剧性结局·知青领袖马司令·北京之一：西单民主墙·北京之二：王震批评知青代表	(1)
第一章：	无奈的世界·精采的人生·悲怆的失落·金顶的佛光	(10)
第二章：	疯人之恋·吻别天使·兽奸的知青·荒原的饶恕	(30)
第三章：	等待戈多·都市的苍白·发财的何亚义·也是一种活法	(44)
第四章：	遥远的孤独·荒原上的残阳·血色黄昏·死去的红卫兵	(56)
第五章：	流动的圣节·40 岁的女人·鹿湖的浪漫·蒲公英的升空	(75)
第六章：	女巫之旅·马车上的风铃·受伤的南方狼·选择现在	(95)
第七章：	温情的残酷·请把你的忧郁给我·寻常人生事	(115)
第八章：	请愿的知青·吉人自有天相·狠批张春桥的英雄·老兵德胜	(129)
第九章：	现代派小巴·悬崖上的血树·坐化的老铁·三色	